

杭州当代文丛

主编 宋涛

明清实录

杭州史料辑录

项文

杭州出版社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强调的是“当代人写当代事，一代人写一代事”，注重的是“亲历、亲见、亲闻”，既不同于党史、国史、军史，也不同于地方志，所以，人民政协征集出版的文史资料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殊的作用，它可以“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

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市政协在开展文史资料的工作中，坚持“团结”、“民主”两大主题，充分发挥文史工作的独特优势，征编了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大量文史资料，为深入认识杭州、研究杭州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第一手资料。

在注重科学发展，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今天，如何使政协的文史工作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有力地推动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文史工作与履行政协职能相结合”应该是政协文史工作的又一鲜明特色。为此，我市政协文史委的同志在新的形势下，积极探索文史工作的新途径和新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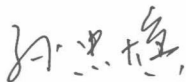
一是创新组织形式。2008年，我市政协文史委的同志在于谦研究会的基础上，组建起杭州文史研究会，以

学术团体的组织形式更广泛地团结全市文史工作者，进一步推动政协文史资料的开发和研究，并开始全面启动杭州历史文化的专题性研究。

二是搭建新的平台。我市政协文史委启动了“杭州当代文丛”编纂工程，这将是政协开展历史文化研究的又一重要平台和展示文史研究成果的又一有效形式，也是汇集文史专家和文史爱好者的有效载体，鼓励专家学者充分运用和发掘“三亲”史料、文献档案资料，结合考古新发现，开展有关杭州的历史文化研究工作，有针对性地为杭州的经济建设服务，为杭州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服务，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奉献新品、精品。

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早在4000年前，杭州的先民就创造了光彩夺目的良渚文化，被世人称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曙光；杭州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承载着长达200多年的吴越文化和南宋文化；杭州具有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前人创造了大量优秀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史学术研究的一座“富矿”。因此，我市政协完全有责任也有条件，通过编纂“杭州当代文丛”，积极推进杭州历史文化研究，进一步发掘和弘扬杭州的历史文化。

“杭州当代文丛”的入选著作，重点是当代国内外学者关于杭州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专著，以及相关的口述历史、调查报告等科研成果。在编纂过程中，市政协文史委的同志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科学研究，充分体现人民政协的兼容性、开放性、探索性和求实性；在编纂的过程中，还应提倡学术创新，坚持“精品意识”，力求达到“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效果，更好地为共同打造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竭智尽力。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孙震' (Sun Zhen), with a stylized flourish at the end.

2010年9月5日

《明实录》《清实录》里的杭州

一

实录作为官修的编年大事记，由同时代史臣奉敕编撰，于史事自然多忌讳，以致遭人贬抑，甚至斥为无史，但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能全面反映各个朝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层面的面貌，即使是那些堆垛繁复的婚丧祭典、繁文缛节，也是研究宫廷生活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加之忠于原始资料如圣谕、臣奏等，很少有编撰者之笔，尤其于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一般均有准确记载，其史料价值自然较其他记载为高，而为国内外学者普遍重视。最早见于记载的实录是南北朝梁时周兴嗣所撰《梁武帝实录》。从唐设史馆始，前一皇帝死后，继嗣之君必敕史臣编撰实录，成为定例，至清末有116部（加唐代以前的共计125部）。但由于年代久远、改朝换代、兵燹交加等，绝大多数已佚，比较完整的惟《明实录》《清实录》而已。

对实录进行加工整理，一般有三种方法：一是原稿影印，二是排版重印，三是辑录子书。其中第三种方法由于凸显区域、专题特色，针对性强，使用方便，早为国内外学者较多采用，并已做出一定成绩。就《明实录》而言，有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钞》（上、下2册，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的《明实录藏族史料》

（3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李国祥、杨昶的《明实录类纂》（21册，武汉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后陆续出版）等。就《清实录》而言，有南开大学历史

系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组的《清实录中俄关系资料汇编》（上、下2册，油印本，1974年印刷），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贵州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邢亦尘的《清季蒙古实录》（3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1981年铅印本），李澍田的《清实录东北史料全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81年出版），李澍田的《清实录朝鲜史料摘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

基于上述背景，本书以杭州包括明代杭州府及钱塘、仁和、海宁、富阳、余杭、临安、於潜、昌化、新城1府9县，清代杭州府及钱塘、仁和、海宁（乾隆三十八年升州）、富阳、余杭、临安、於潜、昌化、新城1府9县为对象，选择摘录与当时杭州的自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资料，加工整理成为《明清实录杭州史料辑录》。这是一部区域性、专题性的文献资料，对全方位了解明清时期杭州的社会面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明代两百多年中，先后编撰了从太祖到熹宗共15朝13部实录，分别为《太祖实录》（内附建文朝）、《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英宗实录》（内附景泰朝）、《宪宗实录》《孝宗实录》《武宗实录》《世宗实录》《穆宗实录》《神宗实录》《光宗实录》《熹宗实录》，凡2925卷、1600多万字。另有清代修《明史》时辑录了一部《崇祯长编》，只可惜佚失了崇祯六年正月到十六年九月的内容，现存残本不足70卷。

那么，在《明实录》里，杭州大致是怎样的面貌呢？

一是水乡灾多。江南号称水乡泽国，在古人的笔下，往往被描

绘成“舟行而鲜车马”、出门需借助船只的水网交织地区，杭州尽管多山，但也不应例外。我们今天津津乐道杭州是座集海、江、河、湖、溪“五水共导”的城市，其实杭州的水若用数字量化，一定难以计数，因而用“水乡”“泽国”等一言以蔽之。

《明实录》把杭州描绘成了水患频仍的地区，在本书的“自然篇”中，有关水灾造成的自然灾害有20条，占明代杭州所有自然灾害的三分之二以上，表明杭州的确属于水乡泽国，把水灾造成的损失下情上报，是地方官吏的工作之一。

二是统治强化。明代，杭州尽管作为浙江省的最高行政驻地，管辖范围也包括1府9县，但政治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即使如此，随着整个专制集权官僚体制的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对杭州的控制表现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府级官吏的升降自然不必说，甚至知县的任用或免职，也多直接过问干预。当然，对所谓有功之臣的后裔则摆出一副恩赐的架势，常常给予官职世袭，不过多是虚衔。

中央政府也关注杭州的地方治安，其中对威胁经济秩序如私铸铜钱之类的大案要案决不手软，从犯案者及其妻子到地方大小官吏一个不放过，都予以轻重不一的惩处。

三是负担沉重。杭州作为江南的一部分，为东南甚至全国的财赋地，“其地湖山秀丽，而冈阜川原之所襟带，鱼盐粳稻，丝绵百货于是乎出，民生自给，谭财赋奥区者，指首屈焉”，每年需上交朝廷大量的粮、丝等物，一旦遭遇天灾人祸，朝廷似乎格外开恩，每每下诏减免上交份额。在《明实录》里，有关地方官吏请求、朝廷同意减免上交粮、丝等物的内容比比皆是，反过来则表明杭州承受朝廷赋税的经济负担的确十分沉重。

为确保东南财赋地源源不断的供给，杭州重视水利建设，如对西湖，针对有元一代未及时治理造成水面狭窄的情况，明景泰年间即提出开浚西湖，并用赈灾余款修筑两闸，又从疏浚到管理提出—

系列的措施，目的是保护水源，使之成为农田灌溉的基本保证。

四是防倭较早。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倭患最猖獗的时期在嘉靖年间，但受朝廷海防整饬政策的影响，杭州早在洪武年间已开始防御倭寇事宜。在一份地方官吏上奏朝廷的报告中，谈到当时杭州、绍兴等地备有防倭船只。据此，当后来倭寇大规模骚扰时，杭州有备无患，迎头痛击，倭寇围杭州城退去，取得抗倭斗争的胜利。

五是礼优先贤。杭州历史上有褚遂良、林逋、岳飞等先贤，朝廷为弘扬他们的高风亮节，不仅修缮祠堂、赐额，而且优待后裔，免其赋税徭役，给予田产。当然，由于孝子节妇向来是传统中国追求的人生境界，对民间出现的这类传统文化的典型人物，朝廷不吝赏赐，每每予以表彰。

三

清代两百多年中，先后编撰了从太祖到德宗共11朝11部实录，分别为《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世祖实录》《圣祖实录》《世宗实录》《高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文宗实录》《穆宗实录》《德宗实录》。另有无实录之名而具实录之体的《大清宣统政纪》，凡4475卷、近6000万字。

与《明实录》相比，《清实录》里杭州的面貌又将怎样呈现呢？

一是旱灾多了。水乡缺水并不多见，水患倒是司空见惯。在《清实录》里，杭州集中遭遇了几次大的旱灾，前一次在乾隆年间，后一次在咸丰年间，前者似乎更加严重，不仅当地农民求雨心切，设坛祈祷，即使官吏也把受灾情形屡屡上报，当雨降时，官民一片沸腾，欢欣鼓舞，看来旱灾的确不轻。

杭州在道光年间发生了一起雷击火药局的灾害，两万多斤火药被延烧，贮存火药的三间房屋“轰失无存”，所幸只有三人受伤。

朝廷起初并不信，以为雷击乃子虚乌有的捏造，是管理不善所致，但地方坚持该理由，便不了了之。

二是治安整顿。与明代大同小异，清代依然格外关注杭州的地方治安，其中对可能威胁政权稳定如北新关有庵堂、水手信奉罗教，余杭、临安拆毁衙门、聚众戕官之类的案件，严厉取缔打击，决不掉以轻心。同时严明吏治，在旗人强入民家、酗酒闹事，兵丁民人斗殴、抢夺铺户导致罢市，福崧之母花费公款游览西湖，旗兵于盐桥茶叶铺强买寻衅等事件的处理上，未偏袒一方，尚属公平，从而保证了吏治清明、地方安宁。

有清一代，康熙帝、乾隆帝十分青睐江南，各有多次南巡。康熙帝五次、乾隆帝六次来到杭州，总的流程大致相同，一般均坐船沿京杭大运河至塘栖，再到杭州，在杭州期间，先对官吏、兵丁、民人作各种恩赐，如蠲免赋税漕粮，派官致祭先贤等，亲自或观赏骑射甚至阅兵，然后打算启程回京，官吏、兵丁、民人依依不舍，上奏恳请再留数日，一般都获允许，继续停留数天，再从塘栖或石门回北京。但乾隆帝在杭州的内容似乎更加丰富，除阅视海宁海塘外，多次表示不愿过多扰民，如对杭州添设座落、点缀装饰，兵丁吹竹弹丝以表欢迎提出批评，以为不仅无补于军队的强大，而且铺张浪费，加重百姓负担。

三是海塘修建。钱塘江是著名的潮汐河流，一日两度的潮汐，侵入两岸，隐患无穷。为保障江南、浙江对朝廷的赋税供给，康熙时修建从六和塔到海宁一带的海塘。由于海塘“关系紧要”，从此以后历代皇帝均十分重视海塘修建，在《清实录》里，有连篇累牍有关海塘修建包括经费筹措、人员配备、材料采购、修建方法、进度催督等的内容，一直延续到同治、光绪年间，尤其是乾隆帝，在六次南巡江南时，有四次到海宁阅视海塘，并对如何修建海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西湖水利灌溉仍然是地方官吏关注的重点之一，此外，地方官吏针对棚户占据余杭南湖造成的危害作了一一梳理，并提出区别对待原棚户、新棚户的方法，目的是弱化棚户占据水面、开垦山地的威胁，防止水土流失，减轻下游水患。

四是兵燹之地。凡王朝建立或走向衰落时，为多事之秋，战乱不休，清代、杭州似不例外。清代初期，清兵南下，进取杭州。方国安、王之仁不愿屈从，率部从富阳攻杭州，双方交战数月，杭州始被完全占领，此后在城西（今湖滨一带）建立旗营，以稳定对杭州的控制。近代以来，杭州先成抗英前线，地方添设炮台，招募水兵，激励士气，严防死守；又是与太平军的角逐之地，起义军两度攻占杭州城，尤其在第二次围攻杭州时，粮食断绝，不能运入，死者不计其数。为夺回杭州城，朝廷组织反扑，调兵遣将，又动用洋枪队，于上海筹集军饷，鏖战多日，百姓深受兵燹之苦。

五是表彰善举。在中国古代，士绅或商人乐于义善之举，如置庄田、建义仓、济族人、办学校等，为当地甚至他乡的公益事业做出贡献。对杭州一些公益组织如同善堂或个人的善举，朝廷或赐额，或鼓励编入地方志书，以资表彰。

凡 例

一、资料来源：明代经历16朝，其中13朝皆有实录，另有《崇禎长编》，本书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逐一辑录；清代经历12朝，其中前11朝有实录，另有《大清宣统政纪》，本书依中华书局1985年版逐一辑录。

二、空间范围：本书所录资料以明清两代行政统辖范围为地域空间，包括1府9县。明代杭州府，钱塘、仁和、海宁、富阳、余杭、临安、於潜、昌化、新城9县；清代杭州府，钱塘、仁和、海宁（乾隆三十八年升州）、富阳、余杭、临安、於潜、昌化、新城9县。

三、资料内容：本书所录资料依次分为自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5类。其中“自然”主要包括天地灾异；“政治”主要包括机构设置、官吏任职、地方治安、奖惩荫恤；“经济”主要包括赋役赈济、储藏调拨、交通水利；“军事”主要包括军需、战争、剿讨；“文化”主要包括褒奖先贤、孝子节妇。有的资料，内容同时涉及几类，本书仅依个人理解归类。

四、本书体例：实录为编年体资料长编，按年、月、日系事，本书仍依其旧；所缺略者，依上文补充。并加圆括号（ ）标出。

五、摘录例则：凡录入本书的每条资料，对少数无关文字作必要删节，以省略号……表示；本书不以“全”为目的，有的资料内容与杭州有一段距离，可录可不录，本书未录入。

六、标点符号：凡录入本书的每条资料，一律重新标点符号；对明显讹误的文字，径予改正，为节省篇幅，未一一标出；对无法

辨清的文字或脱漏，随文标上□，以待考究。

七、出处注法：在每条资料末尾的圆括号（ ）内标出某皇帝实录某卷，以备翻检核对。

《明实录》《清实录》卷帙浩繁，在辑录时难免脱漏舛误，敬请学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将来修改。

| 目 录

总 序 / 孙忠焕

《明实录》《清实录》里的杭州	001
凡 例	001

《明实录》杭州史料辑录

自 然	003
政 治	008
经 济	038
军 事	077
文 化	090

《清实录》杭州史料辑录

自 然	097
政 治	105
经 济	228
军 事	388
文 化	452

《明实录》

杭州史料辑录

自然

（洪武五年秋七月）乙酉，绍兴府嵊县、金华府义乌县、杭州府余杭县大风，山谷水涌，漂流庐舍，人民、孳畜溺死者众。（《太祖实录》卷75）

（洪武九年五月）壬辰，浙江省臣言：“杭州府钱塘、仁和、余杭三县水下田被浸者九十五顷。”诏遣国子生田龄等往验之。（《太祖实录》卷106）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戊午，杭州府大风雷雨，仓廩灾者八十余间。（《太祖实录》卷220）

（永乐元年八月）癸亥，浙江赭山风潮冲击江塘万肆百余步，坏田四百余顷，命工部遣官修筑。（《太宗实录》卷22）

（永乐三年八月）戊辰，浙江杭州等府、仁和等县水淹民田七十四顷四十六亩，漂庐舍千一百八十二间，溺死民男女四百四十一口。（《太宗实录》卷45）

（永乐九年七月）辛未，工部言：“浙江潮水冲决仁和县黄濠塘岸三百余丈、孙家围塘岸二十余里。海宁县风潮，溺死居民，漂流庐舍，坍塌城垣。请发军民修筑。”从之，仍命户部遣官巡抚被灾之家。（《太宗实录》卷117）

(永乐十八年三月)丙子,浙江海宁等县言:湖水淹没边海塘岸二千六百六十余丈,延及吴家等坝。命有司量起军民修筑。(《太宗实录》卷223)

(永乐十八年九月)甲戌,通政司左通政岳福言:“浙江仁和、海宁二县,今年夏、秋霖雨,风潮坏长降等坝,淹于海者千五百余丈。东岸赭山、岩门山、蜀山故有海道,近皆淤塞,故西岸潮势愈猛,为患滋大。乞以军民修筑。”从之。(《太宗实录》卷229)

(宣德三年六月)辛丑,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奏:“主事孙冕自浙江还,言苏、松、嘉、湖、杭诸郡,今夏苦雨,江水泛滥,田稼多淹没。”上命即遣人往与大理卿胡槩巡视水灾之处以闻。又谓原吉曰:“水旱为灾,所系甚大,卿有所闻,当悉为朕言之。”(《宣宗实录》卷44)

(正统三年九月)癸卯,巡按浙江监察御史俞本等奏:“杭州钱塘等县,五月以后弥旬不雨,田禾槁死。金、衢、严、绍、温、处、台、宁八府,亦亢旱无收。”上命行在户部覆实以闻。(《英宗实录》卷4)

(正统五年二月)乙亥,浙江杭州、台州、严州、绍兴、宁波等府,湖广武昌、常德、黄州、荊州、汉阳、德安、岳州、长沙,直隶凤阳、淮安、扬州等府各奏:自五月至今水旱伤稼,秋粮无征。上命行在户部勘实以闻。(《英宗实录》卷72)

(正统十一年秋七月)辛未,顺天府、应天府及直隶河间、保定、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平、宁国、池州九府,浙江杭